

一九〇二年,《大公報》在天津創辦,不久就成長為覆蓋全國的民國大報。那麼,作為「一家在大長河」的哈達鋪的呢?答案是通過當時的郵政系統,民國時期的郵務包括有報刊發行的功能,即開辦代訂報刊和代購書籍業務。根據《蘭州志》記載,一九一四年甘肅郵政局組建,成為獨屬郵區。一九三五年五月,西安到蘭州公路通車,即「西蘭公路」,郵件利用汽車帶運。抗戰時期,蘭州通信樞紐地位逐漸凸顯,當時郵政人員利用自辦和委辦汽車郵運相結合的方式,構成以蘭州為中心的西北郵政幹線通信網絡。哈達鋪的郵政代辦所早在一九一二年就設立,當年管理這個代辦所是一個姓王的陝西商人,他一邊做生意一邊管理郵政業務。

定昌縣紅甘文獻研究室趙玉林介紹,當年的哈達鋪是川甘交界處的棄材商貿重鎮,商號雲集,是西北著名的物資交流要道。正是因為這些商人「到來」,就有了訂閱報紙的需求。他表示,《大公報》從天津到西安大概是通過當時的火車站網絡,從西安到蘭州則通過西蘭公路。專家估



▲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展陳的1935年八九月份《大公報》關於紅軍的相關報道。

藏醫救治周恩來 藏民接力守舊址 重走長征路 探訪俄界與茨日那

7月的迭部,群山蒼翠,白龍江水奔流不息。循着長江的足跡,大公報「追尋范長江 重走長征路」主題採訪團隊一路潮行,抵達甘南藏族自治州深處的俄界村與茨日那村。91年前,中央紅軍穿越雪山草地,於此地统一思想,揮師北上;91年後,紅色記憶與藏鄉煙火交融,仍在這片高原峽谷間鲜活如初。

俄界 一次會議,扭轉危局

1935年9月11日,毛澤東率紅軍抵達迭部縣達拉鄉俄界村——彼時稱高古村,「高古」藏語意為「八個山頭」。因語言差異,紅軍隨行翻譯將「高古」音譯為「俄界」。村中多為藏族同胞,起初受流言蠱惑,避入山林。然而紅軍露宿營下、秋毫無犯的嚴明軍紀,漸漸消滅了隔閡。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村中一座藏式民居內召開緊急會議,史稱「俄界會議」。會上,確定了紅軍繼續北上上的戰略方針,第一次在黨內公開批判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果斷將紅一、三軍團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並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的「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這一決策,如撥霧見日,為紅軍繼續北上、直指陝甘奠定了政治與軍事的基础。

茨日那 一條閣樓,一道軍令

自俄界東行數十里,便是旺藏鄉茨日那村。9月13日至15日,毛澤東借宿於藏族村民李讓家的二層木樓。在這座僅容族同胞,起初受流言蠱惑,避入山林。然而紅軍露宿營下、秋毫無犯的嚴明軍紀,漸漸消滅了隔閡。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村中一座藏式民居內召開緊急會議,史稱「俄界會議」。會上,確定了紅軍繼續北上上的戰略方針,第一次在黨內公開批判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果斷將紅一、三軍團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並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的「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這一決策,如撥霧見日,為紅軍繼續北上、直指陝甘奠定了政治與軍事的基础。

一段醫緣 藏藥療效好,軍民魚水情

最令人感人的,是一段鮮為人知的醫患佳話。長征過草地時,周恩來積勞成疾,肝病纏身,高燒不退。到達俄界後,警衛員偶然「抓獲」一名深夜潛回村中(當地百姓起初因聽信謠言,紛紛躲避紅軍)取藥的藏族青年賽浪——他年邁的母親亦臥病在床,亟需救治。中央領導人聞訊,立即派隨軍醫生前往賽浪家中診治。兩小時後,醫生不僅穩住了賽浪母親的病情,更帶回了賽浪的舅舅——高古寺德高望重的藏醫老喇嘛。他曾在拉薩大昭寺考取「格西」學位,精通醫理。毛澤東和中央首長及衛生部醫官們磋商後決定,懇請老喇嘛給周恩來用藏醫治療肝病。幾天以後,周恩來病情好轉,已能恢復行軍並參與領導工作。這段藏漢同心、軍民互濟的往事,如雪蓮般在高原上綻放,至今仍被兩村老人口口相傳。

五代守陵 一座舊居,一家傳承

時光流轉九十載,茨日那毛澤東舊居的守護者,已是眾讓的孫子——桑澤。自1978年起,桑澤便從父輩手中接過鑰匙,每日清掃、修繕、講解,至今四十餘年。他的妻子在院中操持家務,孩童嬉戲嬉戲。這座二層小樓,見證了五代人的「以守為貴、以讓為榮」的傳承承襲。舊居訪客絡繹不絕,有從香港、台灣遠道而來的遊人,亦有全國各地慕名而至的青年。他們駐足凝視,聆聽講解,在木窗戶間感受那段峥嵘歲月。

今昔之變 長征路成了致富路

回首解放前,迭部縣「刀耕火種」,道路閉塞,百姓食不果腹。據《迭部縣志》載,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收業仍十分粗放。而今,俄界村已於2019年整村脫貧。村中19家民宿依山而建,「紅色旅遊成為支柱產業;「俄界舊藏舊址」聘請當地村民擔任文保員與清潔工,給當地村民提供了新的收入來源。茨日那村旁,紅軍主題的農家樂星羅棋布,桑澤也在守護舊居之餘,售賣自家種的蘋果。另一提之是,迭部特產藏麻豬,因肉質香嫩,在西北地區享有盛名,每斤售價達六十至七十五元,成為鄉親們的「金豬」。昔日的長征路,如今成了致富路;當年的烽火台,如今變作迎客亭。從俄界的民居到茨日那的閣樓,從老喇嘛的藏藥到桑澤五代人的堅守,這段長征往事,不僅是革命史的一頁壯烈,更是民族團結、軍民同心的生動註腳。長征從未過去,它正以另一種方式,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當年《大公報》如何進入哈達鋪?



▲臘子口戰後紀念館內俄界會議場景復原。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計,從天津到蘭州,《大公報》起碼需輾轉三天。從蘭州到哈達鋪的路程大約為三百多公里,並不通車,基本靠步行和馬駝。關於毛主席一行在哈達鋪看到《大公報》,其中一個版本是從一個隨行的馬駝子手裏拿來的。他從蘭州回來,隨行的馬駝子手裏帶有報紙。

獲取報刊過程有多個版本 不約而同指向《大公報》

1935年7月14日,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從成都出發,歷時10個月深入西北追蹤紅軍長征,寫下大量報道在《大公報》連載,成為報道紅軍第一人。今年適逢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大公報「追尋范長江重走長征路」採訪團循着范長江的足跡,打撈這段歷史的更多細節。

尚未駛入哈達鋪,路口一座巨型雕塑便映入眼簾。紅色飄帶仿照《大公報》版面環繞明燈與巨筆,基座上毛體大字「紅星照耀新征程」熠熠生輝,把「一張報紙改變歷史」的瞬間化為具象。

「哈達鋪人人都知道「一張報紙定乾坤」的故事。」哈達鋪老中醫韓輝民告訴採訪團,小時候,自己就從父親那裏聽到了《大公報》和哈達鋪的故事,當年他父親和太爺爺曾給路過哈達鋪的周總理治病。如今行走哈達鋪,無論是紅軍街還是紀念館,處處都有《大公報》的印記。這份報紙對紅軍轉向陝甘革命根據地、推動長征勝利,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哈達鋪長征紀念館講解員對記者說:「我們將這段歷史作為重點展陳內容,近年來館內參觀學習者絡繹不絕,這裏也已成爲重走長征路的重要打卡地。」

夏日的陽光照在哈達鋪紅軍街上,顯得格外亮堂。街上保留了舊時許多藥舖,韓輝民介紹說,義和昌和自己家的藥舖,都是當年比較有名的,毛澤東到哈達鋪的夜渡下榻在義和昌。當地老人耳相傳,義和昌的夜晚,油燈常常徹夜不熄。

紅一方面軍從江西瑞金出發後,經過長途艱苦行軍和連續作戰,8萬多人的部隊,到哈達鋪時只剩下7000多人,將士身體非常羸弱。彭德懷在《自述》中描述:「出臘子口,行軍時常見到道旁有同志無故倒地就死了。那時,幹部和戰士真是骨瘦如柴。」紅軍攻克臘子口進駐哈達鋪,繳獲了國民黨守軍逃跑時留下的幾百石米麵、2000多斤食鹽,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紅軍戰士得到實物資補給。總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食得好」的口號,各連隊都殺豬宰羊,受盡飢寒之苦的紅軍得以飽食,哈達鋪也被譽爲長征路上的「加油站」。

相對於讓疲憊的紅軍得到補給、恢復戰鬥力,接下來紅軍具體要往哪裏去,才是歷在黨中央心頭最沉重的命題。這也是義和昌燭火長明的緣由。

走進義和昌毛澤東舊居,屋內陳設一如往昔:桌上一盞油燈、一支鉛筆,桌面一張《大公報》赫然入目。

轉出義和昌,斜對面約10米處,即爲大名鼎鼎的郵政代辦所——91年前紅軍就是在這裏發現了

俄界會議：堅持北上

●1935年9月11日,毛澤東主席率紅三軍到達甘肅迭部縣俄界,同紅一軍會合。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俄界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的「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指揮機構,並將紅一、三軍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同時,堅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確路線,改變了兩河口會議提出的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確立了在與蘇聯靠近的陝甘廣大地區創建蘇區並求得發展的戰略方針。



▲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展陳的紅軍穿的草鞋。大公報記者謝銳佳攝



▲義和昌藥舖毛澤東舊居,炕前書桌上鋪開的《大公報》。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到陝北去」的傳奇,早已廣爲人知。但多數人只知紅軍在甘肅哈達鋪獲得《大公報》,毛澤東據此宣布進軍陝北;卻少有人知曉,短短數日後,中央在200公里外的通渭縣榜羅鎮,再獲《大公報》印證:陝北有紅軍、陝北有根據地!中央連夜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議:將長征落腳點放在陝甘根據地。

從哈達鋪到榜羅鎮,《大公報》完成長征史上最關鍵的信息接力,中央果斷抉擇,歷史就此改寫。

《大公報》「一紙定乾坤」新解

「一張報紙定乾坤」,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定下「到陝北去」的傳奇,早已廣爲人知。但多數人只知紅軍在甘肅哈達鋪獲得《大公報》,毛澤東據此宣布進軍陝北;卻少有人知曉,短短數日後,中央在200公里外的通渭縣榜羅鎮,再獲《大公報》印證:陝北有紅軍、陝北有根據地!中央連夜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議:將長征落腳點放在陝甘根據地。

從哈達鋪到榜羅鎮,《大公報》完成長征史上最關鍵的信息接力,中央果斷抉擇,歷史就此改寫。



▲位於哈達鋪的《大公報》巨型雕塑。大公報記者謝銳佳攝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此正式決議,將長征落腳點定在陝甘根據地。」

榜羅鎮會議會場,是一間坐北朝南的青瓦土木小屋。屋內陳設極其簡樸:一張木方桌、五把太師椅,桌上一盞清油燈。「均爲當年原物。」康國斌介紹說。牆上懸掛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五人照片,裏面即是毛澤東當年居所。

1935年9月27日,在這間大約40平方米的小屋裏,毛澤東和黨中央連夜做出了「到陝北去」的歷史性正式決議。

榜羅鎮再遇《大公報》 堅定「到陝北去」決心

抵平談陝北匪、8月28日《徐海東獻甘 劉子丹進據綏德南區》等報道連貫刊出,對陝甘紅軍各方活動記述詳盡完整。這批保存在港的原始報刊,與親歷者回憶、地方檔案相互印證,直觀展現出《大公報》在音訊隔絕的戰爭年代,爲革命力量研判局勢、謀劃戰略發揮的關鍵信息價值。

1935年9月20日,黨中央在毛澤東駐地義和昌藥舖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陝甘支隊整編方案。結合從報紙上新發現的情況,9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哈達鋪開南召召開的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明確:紅軍前進的方向是陝北,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9月23日,得到物質和精神「食糧」雙重補給的紅軍告別哈達鋪,意氣風發地往通渭縣進發。

彼時紅軍各部通信阻隔,無論是黨中央,還是孤軍轉戰的紅二十五軍,都曾借助《大公報》這一特殊信息紐帶,捕捉彼此行動線索,據此作出關鍵戰略判斷。據徐海東、韓先楚、劉華清等將軍回憶及陝西省寶雞市鳳縣檔案館館藏記載,1935年7月,撤離鄂豫皖蘇區、由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在陝西鳳縣繳獲一批《大公報》。其中,7月22日《大公報》報道說,朱、毛紅軍已越過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進。部隊結合報載報道與中央文件,研判確認中央紅軍北上動向,果斷作出挺進甘肅、進進天水的戰略抉擇。以此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8月9日晚,徐海東率部攻佔天水北關,接着攻克秦安縣城,威逼靜寧,鉗制和吸引了大批敵軍,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達到了策應中央紅軍川西行動的目的。而當年8至9月的《大公報》,也持續記錄紅二十五軍在甘肅一帶的軍事活動。

走進香港島南區的大公報檔案館,翻開紙色已經黃褐的1935年《大公報》,7月23日《陝北赤匪愈嚴重化 全陝北23縣幾盡赤化》、8月1日《高桂滋

榜羅鎮會議：正式決議落腳陝甘根據地

●193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到達甘肅省定西市通渭縣榜羅鎮,中央機關就設在榜羅鎮中心學校。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通過在學校發現的《大公報》等報紙上,再次印證了陝北有蘇區和紅軍的消息,更加堅定了「到陝北去」的信心。2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羅鎮召開常委會,會議決定將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甘根據地。9月28日清晨,陝甘支隊冒着小雨,在榜羅鎮中心學校附近的一個打麥場召開全支隊連以上幹部大會。會議介紹了陝甘根據地和陝甘紅軍的狀況,提出了迅速到陝甘革命根據地集中的行動方針。

吳起鎮會議：明確「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

●1935年10月21日,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保安縣吳起鎮。至此,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一年的長征結束。紅軍途經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陝西11個省,行程二萬五千里。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關於目前行動方針》報告,核心內容包括批准榜羅鎮會議決定,明確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提出「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的新使命。

四次會議環環相扣,黨中央把握航向、果斷決策,不僅戰勝了張國燾分裂主義造成的嚴重困難,也使黨和紅軍得以進到領導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國革命的前沿陣地,真正實現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黨和紅軍由戰略被動到戰略主動的勝利轉折,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極爲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935年9月28日凌晨,毛澤東在核桃樹下陝甘支隊連以上幹部會作進軍陝北總動員。目前,125年樹齡的核桃樹仍碩果纍纍。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位於哈達鋪的《大公報》巨型雕塑。大公報記者謝銳佳攝

康國斌解釋連夜開會的緣由:「紅軍在這間學校裏又搜集到《大公報》等一批報刊,印證了此前在哈達鋪得知的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的情報。新的信息進一步堅定了中央「到陝北去」的決心。」

舊址展板上,泛黃的《大公報》靜靜陳列,不遠處摘錄了毛澤東在吳起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榜羅鎮會議(由常委同志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與紅軍,所以改變決定,在陝北保衛與擴大蘇區。」

諸多回憶錄記錄下中央在榜羅鎮獲取報刊的情況。開國上將、時任陝甘支隊第十一大隊政治委員王平,在《王平回憶錄》中描述說:「過了渭河進入榜羅鎮,部隊休息了一天。紅軍在當地小學發現很多報紙雜誌,上面刊載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北方的報道,也有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消息。」而穩定華在《從甘肅到陝西》一文中寫道,榜羅鎮「有一個小學校供給了很多報紙雜誌給紅軍,中國共產黨及紅軍領袖閱後,覺得關於日本在我國北方侵略的許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討論。」兩文所指小學,正是榜羅鎮中心學校。

核桃樹下總動員 三軍過後盡開顏

在榜羅鎮會議紀念館前,康國斌向大公報記者介紹一棵見證偉大歷史的百年老樹:「毛主席就是在此這棵核桃樹下,作出進軍陝北的總動員。」

這棵樹齡125年的老核桃樹枝繁葉茂,樹冠可覆蓋半畝地,掛滿青果。「每年還能結上千斤核桃。」康國斌言語中透着自豪。

1935年9月28日凌晨5時,中央剛剛開完常委會數小時後,千餘人規模的連以上幹部大會,就在核桃樹下的打麥場召開。

「當時國民黨飛機總是八、九點鐘以後出現,為了躲避轟炸,幹部會議就選在拂曉召開。」康國斌解釋道。

核桃樹四周是打麥場,當時還有老樹剛收割不久留下的麥垛。細雨濛濛,毛澤東站在小方桌前,向全軍宣告:長征最終落腳點確定爲陝北。

次日,紅軍攻佔入甘之後首座縣城通渭,並依據所獲報紙信息手繪《陝甘蘇區略圖》,爲紅軍北上陝北提供了重要的地圖指引。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毛澤東進通渭後在文廟街小學接見廣大大指戰員時,滿懷豪情地首次朗誦了他的新作《七律·長征》。

10月2日凌晨,陝甘支隊兵分三路,向陝甘蘇區挺進。10月21日,紅軍陝甘支隊抵達陝甘革命根據地保安縣吳起鎮。至此,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束。